

赤子心,家国情

□黄团元



黎雪(后排左二)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担任英语翻译,前排中为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。

遭遇险境,多亏王季香冒着寒冷从水中爬上岸, 绊倒敌人,压在艾黎身上保护了他。洪湖赤卫队缴获了亟须物资,大获全胜,艾黎对这位有双黑宝石眼睛的小战士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王季香小小年纪,能顶大用。他除了能够完成侦察任务,还能辅导没文化的赤卫队队员识字。赤卫队队员没有不喜欢他的。可惜在一场战斗中,王季香身负重伤,赤卫队将他送往武汉医治。病情好转后,地下党又将他转到孤儿院养伤。

正是在这里,他再次遇到了艾黎。艾黎不仅多分给孤儿院物资,还特意视察,当看到王季香时,他紧紧抱住这位小战士,热泪盈眶地说:“跟我到上海去!”

路易·艾黎,这位1897年生于新西兰的友人,1927年来到中国,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担任消防处防火督察等职。他请名医治好了王季香的伤病,并送他到麦伦中学念书。这所学校在华人校长沈体兰的改革下,推崇爱国主义教育。王季香通过恶补达到了就读中学的文化程度,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。每逢节假日,他就回到艾黎家中做清洁、做家务,艾黎对他更加怜爱。

1933年,艾黎结识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,王季香也因此认识了孙夫人,得到了母爱般的关怀。后来黎雪夫妻在延安结婚,介绍人便是宋庆龄和艾黎。1934年,艾黎成立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,他的家成了秘密革命工作的堡垒。王季香在学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,常为“小组”秘送情报,分发红色印刷品。1937年艾黎让共产国际中国组在自家设置秘密电台,与延安及多地下党组织联系。

面对搜查,王季香机智应对,保护了电台。王季香成熟了,成为有知识向往革命的优秀青年。同年,19岁的王季香经宋庆龄和艾黎介绍,改名黎雪,赴延安参加革命,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白求恩大夫的首任翻译

据黎雪向王培林回忆和1981年7月30日在《羊城晚报》发表的《在白求恩同志身边》记叙,

1938年3月18日,他随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姜其贤及卫生系统的同志,在延安南关外大道欢迎“一位身着西班牙人民军军装、肩缠五星、碧眼褐发的外国人,那就是白求恩大夫”。这次组织给黎雪的任务是担任白求恩的翻译。

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、著名的胸外科专家。他步行到延安凤凰山军委安排的窑洞,却让黎雪住里间,自己住外间。两人迅速熟悉起来,白求恩询问黎雪眉宇间的疤痕来历,黎雪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自己原是洪湖赤卫队红小鬼,六年前在战斗中负伤,疏散到武汉,幸遇艾黎,将他带到上海治伤,学习。白求恩兴奋地说艾黎是他的好朋友,要黎雪向艾黎学习,简洁准确地为他翻译。他还郑重送给黎雪一本英文版的《列宁主义概论》,叮嘱他加强学习理论。

有一次手术,护士琼·尤恩递错了手术刀。白求恩批评:“治病救人,应该手、脑配合一致!”还有一次战役前,白求恩要求在限定时间备好医药器械。因为时间紧,有人未能完成,受到白求恩的严厉批评。黎雪没有翻译原话。白求恩似有察觉,让黎雪如实转达。黎雪说:“他们都明白了。”白求恩看到被他批评的人正在努力,认可了黎雪为他做的“缓冲”。为让白求恩劳逸适度,黎雪每天早晨带他爬山或散步,白求恩时常唱起西班牙战争中的歌曲《塔洛莽莽之歌》:“我的家乡在远方,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……”还斗志昂扬地唱起《保卫马德里之歌》,唱完又教黎雪唱。他还要黎雪教他唱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。顿时,宝塔山上响起男声合唱:“黄河之滨,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人民解放,救国的责任,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……”

1938年4月20日晚,毛泽东主席在窑洞接见白求恩大夫。毛主席十分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,询问后向他阐述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;讲解红军为何长征,最后高瞻远瞩展望抗日斗争的前景。白求恩听了,激动地从贴胸衣袋抽出加拿大共产党的党证,双手递给毛主席看,还请求到抗日前线去。这次会见,黎雪作为唯一翻译,见证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毛泽东主席亲切的谈话。直到皓月当空,毛主

黄鹤楼灯亮起的时候

□徐迅

触角,像戏曲演员头上的翎子,威风凛凛,提到它们后都会用一根长线将它绑住,放风筝一样看它们一通乱飞,却又逃不过人的手掌心。我也会和邻居小伙伴去上山“探险”,其实也就是沿着山间小路走一走,感受林间穿袈的自在与快乐。

我小时候曾问过家中长辈后面的山叫什么山?答曰是凤凰山。这个很美的名字让我一度陷入遐想,这山上是否真的有过凤凰神鸟?多年以后,在翻看相关书籍掌故时方知,凤凰山得名始于三国时期:“吴主孙权黄龙元年(229年)四月,武昌有黄龙凤现。”凤凰山麓下是清代武昌贡院。有乾隆年间编撰的《江夏县志·贡院图》上所绘,武昌贡院正位于武昌城北部凤凰山南麓。“宋初曾在此设县学,以后改为州学。明洪武年间设‘湖广贡院’,到永乐年间,贡院独立建,自成一区。武昌是湖广行省治所,为文教繁盛之地。”清末,湖南另设乡试考场,武昌贡院仅为湖北考生考场。1920年,由清末张之洞开办的几所小学堂合并,利用贡院的校舍开办了武昌“模范女子小学”,这就是今天湖北省实验中学的前身。媒体曾报道,20世纪60年代武昌贡院明远楼还在当时这所校园内,后被拆除。我又特意回了家中长辈,她还记得那时候的明远楼有着琉璃瓦屋顶,巨大的圆柱,他们小时候称其为“奎光楼”。如今,几年前重建的“明远楼”已矗立在省实验中学的操场。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凤凰本就是杰出人才的象征,而这里从古至今都是荆楚文脉的发扬地,现在是百年名校省实验中学,培养出的青年才俊,层出不穷,凤凰山之名,还真是相得益彰。

还有附近的花园山,有一年三姨带我去爬花园山,这是他们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。爬上花园山,山风浩荡,眼里是半个老武昌城。花园山虽然不大,但我仍可以做一个“徒步家”,探寻山上众多的人文历史遗迹。山顶有一块万墓墓碑,触目惊心地记载着一段往事。山顶上还有罗马风格的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,以及花园山天文台遗址留下的断壁颓垣。这让我想

到了上海佘山上的大教堂和天文台。从历史照片上看,曾经的花园山天文台没有佘山天文台外观那么恢宏,但是小巧秀丽、浑圆的穹顶上有几分宗教色彩的彩色玻璃花窗,增添了梦幻与神秘的氛围。它是武汉最大的天文台之一,近一个世纪以前,在这里观看璀璨的星空,仰望无边的宇宙,是如何的宁静与浪漫。1938年前,它还每日汇总宜昌、沙市、老河口等地气象数据,与上海佘山天文台联合发布气象信息。只可惜如今上海佘山天文台完好并仍可使用,而花园山天文台则在1938年武汉沦陷时遭遇大劫,日军将天文台内的仪器洗劫一空并拆毁,天文台只剩下残垣断壁。

胭脂山和螃蟹岬之间,就是鼎鼎大名的昙华林了。如今的昙华林,游人如织,在路之尽头有一所古朴的小学——昙华林小学,我母亲曾在读此书。1945年,昙华林小学正式建校,校训是:“中国人了不起,中国人了不起,我要做个了不起的中国人。”数十年过去了,学校还在这里办学,背着五颜六色书包的孩子们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进进出出,为这条古老的街巷增添了更多的生气,为这片网红景点带来了许多人间烟火。

有一年我和朋友来到昙华林当年名噪一时的网红店“大水的店”,我们坐在店里的二楼喝咖啡,突然有一只猫从我们的窗边施施然信步走过,这才发现窗外就是别人的屋顶。这就是昙华林和别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不同了,它建在山与山之间,推开窗有着别样的风景。那错落有致的古旧房屋、层层叠叠的红瓦屋顶,鲜花开满的小院,还有点缀其间的青葱树木,有参差多态的美,而“山居岁月”让时光都慢了下来,静了下来。这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老舍,何以如此喜爱武昌,喜爱昙华林,喜爱他居住过的云架桥。“到了云架桥,好似到了老家,地僻巷静,绝无人声,一睡就是一夜!……街市清静,蛇山脊立城中,冬青抱翠,至称冷隽。黄鹤楼上,只卖清茶;中外的风流事统统在汉口,一江之隔,绝不相侵。”在他眼里,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,“城里有山,山上有树”。昙华林就是这

清廉如水

□马河

席才和白求恩并肩走出窑洞。多年后黎雪还记得:毛主席站在窑洞前目送白求恩离去,白求恩依依不舍多次回头。

1938年5月,黎雪随白求恩渡过黄河,到达山西西南县东城镇120师司令部。白求恩仅用一个星期,就为520名伤员做了检查;一个月,就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。在医疗器械缺乏的环境里,许多器械都是白求恩制作。黎雪还现场翻译白求恩说自己是“O型血”,为做手术的伤员输血。

叶剑英、杨尚昆、王震等领导来看望白大夫送些食品。白求恩推辞不掉,就让黎雪转送给医护人员和伤病员。他每月有一二百元生活费,都坚决谢绝。上级派给他警卫员,他让警卫员去前线代表他冲锋陷阵。

120师是1937年工农红军改编后的三大主力师之一,师长是开辟江湖革命根据地的贺龙。贺龙看到他的小战士因为艾黎成了文化人,十分欣慰。他向黎雪了解白求恩的饮食习惯,黎雪说他只吃小米稀饭,每顿两个鸡蛋还分给别人吃。第二天贺龙和白求恩一起进餐。白求恩说他早就在加拿大,在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里,“知道了贺师长两把菜刀起义的故事,它鼓舞我用手术刀铲除恶魔!”

贺龙连连摆手:“我们见面前,天天有人向我传颂白大夫的事迹,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都爱你敬你谢你,今天一见,你的事迹又鼓舞了我!”白求恩说:“您太谦虚、和蔼。”贺龙扬起浓眉:“当我厉害的时候,你可能见而生畏呢!”两人大笑起来。

白求恩见贺龙不离烟斗,道:“贺司令的烟斗不亚于起义用的那把菜刀。我看你有个大的烟筒就更好了!”贺龙摸摸嘴:“可惜我的嘴挂不住,若有办法,一定换个更大的。”又是一阵大笑。

因前方需要,白求恩前往五台山工作。而120师野战医院和师部许多资料亟须翻译处理,黎雪转回延安。黎雪期盼再为白求恩服务,谁知1939年11月12日,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以身殉职。12月21日,毛主席发表《纪念白求恩》,给予高度评价。黎雪决心学习白求恩,做一个高尚、纯粹的人。

黎雪小小离家,对老家是陌生的,对父母是模糊的。他想想想亲人,可就在他离开上海去延安后的1937年8月13日,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黄浦江。黎雪只得将想家思亲化作消灭日本鬼子的斗志。

黎雪离开上海去延安后,艾黎先后在上海、陕西、甘肃等地活动,1953年移居北京。黎雪经常去看望艾黎或接他来家享受天伦之乐。无论在航空、国防工业等领域工作,黎雪都将周恩来的“站稳立场,掌握政策,熟悉业务,严守纪律”的题词当作座右铭,对“亲人”葆有赤子心。

1987年12月27日,“中国十大国际友人”之一路易·艾黎在北京逝世,黎雪悲痛万分。送别艾黎半年后,黎雪身体不适,待王培林一家到北京探望时,他说他们理解自己没为王家谋私利,希望王家后代都像艾黎爷爷一样爱中国,都像白求恩大夫一样做人。

1988年12月29日,黎雪因病在北京逝世,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,400多人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。《人民日报》发消息称他是“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有的外语和专业技术人才,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的航空、国防工业及对外经贸工作发展均作出了积极贡献”。遵黎雪遗嘱,他的一半骨灰陪在路易·艾黎身边。

30多年过去,黎雪的老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。(黎雪侄孙、王培林之子仙桃市公务员王中平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)

样,小山环抱,绿树葱茏,是自然景观与人居建筑的完美融合,有着老中国的气质和韵味。真实、亲切、温馨,能让人找到古典的安逸与宁静。这里留下了老舍念念不忘的身影,也留下了郭沫若、阳翰笙、胡愈之、田汉、洪深、洗星海、钱基博等人的身影。历史的厚重、人物的风流、名流的故事,都在这里被久久诉说。

至于蛇山,今天的武汉人已自觉将蛇山和黄鹤楼让给外地汹涌而来的游客。至于武汉人观赏黄鹤楼,也不要在地铁司门口黄鹤楼站C口,衬着红墙黛瓦,着青绿朱红的汉服,拍“穿越古今”的艺术大片;也不要再在长江大桥北侧,向街边伸手探头,拍与灯火辉煌的黄鹤楼合影的大头照;也不上司门口天台,在天桥上近距离一览黄鹤楼的景色。

如果站在长江中坐游轮看灯光秀,武昌江滩的一丛高楼流光溢彩,而黄鹤楼,是其中绝妙的C位,金光四射,正大仙容,呈现的是开阖雄浑的诗人气象。而游轮和轮渡,也早成了网红打卡点。武汉人也不与外地游客争美,热闹是他们的,是游客们的。

清代学者张潮用“看月亮”来比喻读书与人生的三重境界。第一种,“隙中窥月”,大多数的人,只能在窗子里面看月亮。第二种,“庭中望月”,到了庭院里面望月,感受天地之开阔,世界之广大,胸襟、气象更上一层楼。第三种,“台上玩月”,独立高台,俯仰天地万物,只见天地澄明、宇宙浩瀚。武汉人赏黄鹤楼,就是这第三种,也如同《红楼梦》里贾老太太赏月,是“赏月山上最好”。无需那华丽的灯火绚烂夺目,要如贾母赏乐,隔水听琴音,但“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”,悠悠扬扬的乐声穿林度水,闲闲慢慢漫来,趁着明月清风,天空地净,令人心旷神怡,万虑齐除。

一次同学聚会,晚上从昙华林某山顶网红店出来,这里看不到灯光秀,没有五色炫耀、光夺眼目,却只见远山淡影,近一点的花园山、凤凰山、胭脂山,远一点的蛇山,小山如沉睡的野兽,恬然安静。一抬头赫然看到树枝疏影横斜之间,远处蛇山上亮灯的黄鹤楼,指甲盖大小,却是晶莹剔透,如同天边的琼楼玉宇,一片清凉,疏离、晶莹玲珑,涌上心头的是黄庭坚的诗:“清风明月无人管,并作南楼一味凉。”这一刻,黄鹤楼又成了一阙宋词。

夜晚,当黄鹤楼灯亮起的时候,武昌,就成了武昌城。

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,水的自然属性与廉洁精神高度契合,渊源深厚。

自古以来,水被视为生命之源,同时也是廉洁的象征。在我国,水被赋予了诸多美德。水的清澈透明、无私滋养万物的特性,常被用来比喻人的廉洁品质;历史上的清廉官员,多被形容为清廉如水。

当然,水也潜藏着一一定的危害,当它失去控制时可能引发洪灾,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治水需要科学规划、合理调度、严格管理。正如治贪需要法治、监管和道德约束一样,二者在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战国时期,魏国邺县连年水患,百姓苦不堪言。西门豹接任县令后,调查发现“河伯娶妻”是巫婆与当地官员为大肆敛财所搞的迷信活动,背后隐藏着贪腐问题。他将计就计,果断地惩治了巫婆和当地一伙贪官污吏,并带领百姓疏浚河道、兴修水利。最终,邺县不仅解决了水患问题,还实现了农业丰收,百姓安居乐业。西门豹的故事不仅展示了其高超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,更体现了他廉洁奉公、为民解忧的高尚品质。西门豹的智慧,在于看清了“水患”与“贪患”的因果关系:若贪官不除,治水的钱粮会被挪用,治水的工程会被敷衍,即便筑起堤坝,也不过是“豆腐渣工程”。既挡不住洪水,更挡不住民心的流失。他治贪的手段,既有“雷霆一击”的震慑——以“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的方式清除贪腐源头,又有“长效疏导”的远见——通过兴修水利、发展生产,从根本上铲除了贪官污吏借“水患”牟利的土壤。

将治水与治贪进行类比,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治水需要疏通河道、修建堤防、调节水量;治贪则需要完善法治、加强监管、严惩腐败。例如,在河道管理中,如果放任泥沙淤积,就会导致洪水泛滥;同样,在反腐败斗争中,如果纵容腐败行为、忽视监管责任,必将导致贪腐现象愈演愈烈。

追溯水与廉洁的历史,最早可触及中华文明的源头。《尚书》记载,大禹治水时“卑宫室而尽力沟洫”。这位治水英雄宁肯住着简陋的宫室,也要将全部精力投入河道疏通。其“克勤克俭、公而忘私”的品格,正是后世“廉吏”的精神原型。

这种精神在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身上得到延续。他倾家荡产修建水利工程,却对送礼者严词拒绝:“吾官爵已高,不敢以财货累身”。北宋包拯在端州知州任上,面对当地特产端砚的贿赂诱惑,以“不持一砚归”的决绝,将清廉治水推向新的高度。这些治水先贤用行动诠释:水利工程的根基不仅在技术,更在治水者的心性修养。

《管子》有云:“水者,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,诸生之宗室也。”水滋养生命,却也能因“壅塞”而成灾;正如权力滋养社稷,亦能因“贪腐”而溃堤。

古往今来,治水好比治贪的事例俯拾皆是。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,提出“束水攻沙”的方略。核心是通过收紧河道、提高水流速度,将泥沙冲入大海,而非任由泥沙淤积河道。这与张居正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治贪手段何其相似:当时的明代官贪腐成风,地方官吏巧立名目、横征暴敛,百姓不堪重负。张居正没有逐一查办贪官,而是推行税制改革,将田赋、徭役和杂税合并,折算成银两缴纳,简化了税制,又堵住了官吏从中渔利的漏洞——正如潘季驯“束水”以“攻沙”,张居正“简化制度”以“治贪”,二者都是通过“优化机制”,让“贪腐”如泥沙般无处堆积。

清代林则徐治理水利,亦藏治贪智慧。他在江苏任上,发现苏州、松江一带的河道因年久失修,淤塞严重,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。而地方官却放任不管。林则徐亲自带人勘察河道,制定疏浚方案,同时严令“官吏不得从中克扣工银,豪强不得阻挠施工”,一旦发现贪腐行为,立即严惩不贷。他曾说:“治水若不能去贪,治贪而不去根。”在林则徐看来,治水的款项,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;而治贪的关键,在于“透明”。他将治水的工料、钱粮、工期全部公示于众,让百姓监督,这就像在河道旁设立“水位标尺”,让水流的动向、泥沙的淤积一目了然,贪官污吏自然无从下手。

江河奔涌,廉洁长存。当现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,回望历史长河中的治水智慧,我们获得的不仅是技术借鉴,更是对政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知——唯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,让监督如水般无处不在,方能重现“江河安澜”与“政清人和”的双重愿景。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留给世界的永恒启示:最好的治水,是让每滴水都闪耀廉洁的光芒;最深的治贪,是让公权力像清水般纯净。